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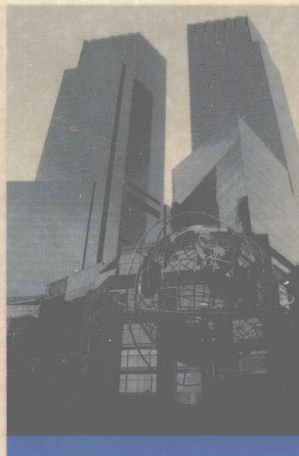
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

〔美〕入江昭 (Akira Iriye) 著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入江昭是国际主义最强有力的倡议者，
他的著作将成为21世纪的必读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球化译丛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

〔美〕入江昭 (Akira Iriye) 著

刘青 颜子龙 李静阁 译

刘青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 / [美] 入江昭著; 刘青, 颜子龙, 李静阁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

(全球化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0573 - 5

I. 全... II. ①入... ②刘... ③颜... ④李... III. 国际组织 - 研究 IV. D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7100 号

· 全球化译丛 ·

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

著 者 / [美] 入江昭
译 者 / 刘 青 颜子龙 李静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宋培军
责任校对 / 秦 艳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3.4 字数 / 22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73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8 - 3799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本书中文简体字版
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此书英文版译出。

《全球化译丛》总序

1998年我主编了国内第一套《全球化论丛》，距今已经十年整。这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的十年，而促使这种巨大变迁的根本动因之一，便是全球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球化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在推动国内学术界的全球化研究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功勋卓著。在过去的十年中，社科文献出版社既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又出版了众多中国学者的全球化专著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社科文献的“全球化”系列，不仅形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产品，也成为中国学界全球化研究水准的一杆标尺。

出版社决定进一步整合旗下的各种全球化翻译作品，推出新的《全球化译丛》，谢寿光社长又嘱我再为译丛做一个总的序言。作为国内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我责无旁贷。其实，我已经为各种全球化译丛或论丛写过好几篇序言。适应当时国内全球化研究现状的需要，在那些序言中我反复表达的意思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既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



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现在，上述这些观点几成共识，无须再强调。尤其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不仅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而且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化赢家之一。

那么，在这里再说点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并使之走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实力。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想象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毫无疑问，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将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识。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使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学

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应当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智慧是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看到与先进者的差距就垂头丧气。

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对立起来，似乎有你无我，有我无他。首先不问观点是否正确，事物本身是否对人民有益，而是一上来就问姓“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给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具有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蒂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地停滞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我们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俞可平

2008 年劳动节于京郊方圆阁

译序：对 20 世纪国际史的另一解读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立新

入江昭是当代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退休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入江昭于 1982 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 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0 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荣誉勋章。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被费正清誉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①其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诸多新解释，更在于他领导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②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 80 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长期由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所主导。前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权力体（power），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视为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过程；而后者把国家视为经济体，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商业利益。但是，早在冷战正酣的 80 年代初期，入江昭就提出应把国家视为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间的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即不同国家（民族）

① John King Fairbank, “Introduction”,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7, p. vii.

② 关于入江昭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可详见王立新为入江昭的《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中文版撰写的译序：《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

的“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① 入江昭提出的研究国际史的这一文化视角在当时响应者并不多，可以说是曲高和寡。但是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问题的凸显和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日益重要验证了入江昭的远见。如果说外交与国际史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话，入江昭实际上是文化转向的最早的、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入江昭主张把外交史发展成为国际史，在 21 世纪初又提出国际史的“国际化”，倡导历史研究的非国家中心取向和跨国史研究，号召历史学者关注跨国事态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更好地理解对当代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的全球化潮流。目前，在美国史学界，国际史和跨国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哈佛大学历史系更是国际史研究的重镇，至少有 5 位学者把国际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国际史学家作为自己的学术身份，这与入江昭的大力倡导有莫大关系。可以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两大范式转变——文化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过程中，入江昭都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和领军人物。作为跨国史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从 20 世纪末开始，入江昭开始对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在史学界又开风气之先。《全球共同体》就是其研究国际组织的结晶。

自国际（关系）史学科产生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关于 20 世纪国际史的标准叙事是从一战的起源开始，然后是大战、凡尔赛的和平、大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二战、冷战

^①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Michael J. Hogan, e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5.

的起源、冷战时期的热战、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一基于现实主义国际观念的标准叙事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解释国家间冲突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而其他国际事态要么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要么被放在战争起源的框架内加以理解，从而丧失了自身的意义。比如国联的历史地位是被放在二战起源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因其在阻止战争爆发上的无能为力而被视为一个失败的组织，而国联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培育国际主义意识等方面的作用则很少被人提及。同样，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态都被纳入到冷战和美苏对抗的框架中去考虑。用入江昭的话说：“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就国内发展而言，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受到了冷战紧张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反过来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共同体》英文版，第 61 页。后面引自该书的文字仅标出页码）解释 20 世纪国际史的这种传统范式在国家间冲突主导国际关系的冷战时代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也使国际关系史成为显学，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和学生。但是这种传统的国际史叙事把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间的冲突置于优先与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视 20 世纪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重大发展，极大地遮蔽了人们的认识。20 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和冷战，经历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在战争硝烟和对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而这些在 20 世纪国际史著作中基本上是不看到的。特别是当代，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削弱，影响国际事务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态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史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新的国际史叙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化现象。

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20 世纪国际史的范式,该书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行为,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组织自 19 世纪末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入江昭试图“描述国际组织在一个正日益全球化或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第 8 页),他在书中把国际组织分为两类: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者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正式的协定建立的、代表其相应政府的机构”,而非政府组织是指“自愿的非政府、非营利、非宗教、非军事的团体”。由于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作者将重点放在六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即从事人道主义救助、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与环境保护的组织上(第 6 页)。入江昭在书中论证说,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导致了战争和冲突,而国际组织自 19 世纪末以来却积极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发展援助,保护环境和捍卫人权,其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依赖意识,对 20 世纪人类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 20 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热战与冷战,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至少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 1855 年成立起,国际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 1909 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共有 213 个,其中非政府组织有 176 个,政府间组织有 37 个。^①到 2000 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 53841 个,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 47098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则有 6743 个。国际非政

^① 此为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数字。见该组织网页: <http://www.uia.org/statistics/organizations/yth299.php>。(2008 年 11 月 8 日)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被认为是成立于 1865 年的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府组织占国际组织的 87.48%。^① 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是全球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爆炸性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被认为是 20 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带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 20 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 19 世纪后期的意义”。^②

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是，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有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组织，^③ 冷战结束后，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显学，^④ 可是直至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家关注国际组织的问题。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与其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严重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入江昭以其一贯的对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把握能力，开始从历史的视角对国际组织进行研究。入江昭称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有三个：

-
- ① [Http: //www. uia. org/statistics/organizations/1. 1. 1b. pdf](http://www.uia.org/statistics/organizations/1.1.1b.pdf). (2008 年 11 月 8 日)
- ② Leste M. Salamon, “The Rise of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4, Jul/Aug. 1994, p. 109.
- ③ 如 Evan Luar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The Emerging Framework of Interdependence*, London, 1977; Harold K. Jacobson, *Networks of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1979; Johan Galtung, *The True Worl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 ④ 重要的有: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1989; Paul. F. Diehl, e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Boulder, 1997;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dford, 1999. 近年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我国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据初步检索，截至 2008 年 10 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题名的文章有 48 篇，相关的专著也有近 10 部。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从 19 世纪晚期以来，国际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范围上、还是活动的多样性上都在稳步发展，以至于若无视国际组织，则无法理解当今世界。其次，大多数关于现代世界事务的著作，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此学术空白必须得以填补。最后，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的单位，这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也使得我们得以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第 1 页）

从入江昭给我们提供的观察和研究 20 世纪国际史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事件和事态，同时对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态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国际组织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在入江昭看来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了跨国性的关切并进而加强了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意识”（第 7 页）。20 世纪 30 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但入江昭指出，其实“在 30 年代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第 36 页）。从冷战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20 世纪 50 年代无疑是地缘政治冲突极度紧张的年代，但是，入江昭告诉我们，实际上在 50 年代还存在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50 年代全球化是比地缘政治现实更具渗透力的力量，在冷战之外，它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第 62 页）其中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活跃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和非殖民化运动。这些都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来驱动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比以前更加活跃”，“它们试图将世界从一个两极化的分裂状态转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第 65 页），“它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大国政治无关，但是它们对世界各地繁荣与福祉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冷战。”（第 73 页）入江昭还提

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并非发生在 90 年代末冷战的逐渐结束，而是开始于 70 年代世界事务的新变化，包括美中以及美苏关系的缓和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纳入国际共同体中，东西方人员和信息交流的增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等。这些新变化导致世界各个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整合在一起”，“国际关系的历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第 127 页）。入江昭后来更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从 1970 年开始进入当代时期，也就是说，当代不是始于苏联的解体，而是“1970 年左右”。^① 入江昭这一系列新解释尽管不会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但却是发人深思的，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从而发现新的史实和意义。《全球共同体》无疑是入江昭对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创性的贡献。

《全球共同体》不仅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新的关于国际组织的丰富知识和观察 20 世纪国际史的崭新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大多数关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把冷战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视为一个崭新的现象，而少数关注早期国际组织的学者则很少意识到国际组织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更没有将其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入江昭既借鉴了社会科学家自 70 年代以来开始研究国际组织的成果，又对国际组织的演变和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思考，有助于历史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进行对话。

二

入江昭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全球共同体。他把全

^① 入江昭：《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刘青、张洁洁译，王立新校，《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 4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 8 页。

球共同体定义为“一个基于全球意识的跨国网络”，“这一全球意识指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一个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的更为广阔的世界，任何个人和团体在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中都共享一定的利益和关切”。而国际组织则是全球共同体的“制度形式”（第8页）。在他看来，国际组织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们影响了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是还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是以与国家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其影响的，因为“政府间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需要一个前提，即各国和各族人民必须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国家界限的某些利益和目标，并且通过资源共享和实行跨国合作（而非个别国家的单方行动）可以最好地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第9页）。民族国家关注的是自私的国家利益，它们对权势、荣耀和利益的无休止的追求带来的是冲突、战争和世界的分裂；而国际组织追求的是国家间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福祉，它们对全球公共问题的关注带来的是和平、和谐与相互依赖意识，在入江昭看来，则是全球共同体的萌芽和成长。

要把握入江昭的思想，需要理解“全球共同体”这一概念。“全球共同体”不同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或 system of states），甚至也有别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或 society of states）。一般说来，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国家交往和互动就会形成国际体系，^①“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与全球共同体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仅仅是民族国家，同时国际体系也不需要参与者拥有共同的文化与行

① 英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产生了足够的联系，对于彼此的决策具有足够影响，使得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而行为时，就形成一个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9-10.